

赴德特派记者访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生林海

让学生了解历史很重要

新民晚报记者 齐 旭

还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海来自慕尼黑。研究经济问题的他谈起二战以及战后德国，总是会提到民族主义这个话题。林海认为，糟糕的经济状况容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避免的，而不仅仅是德国。

不要极端民族主义

“在德国，没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那是过去的坏东西，是纳粹的概念。”林海对新民晚报记者说，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德国人渐渐意识到，为国家骄傲不一定是好事。

祖父祖母曾给林海讲过许多二战时期他们的生存故事——缺少食品、渴望稳定的生活。虽然德国最终成了战败国，“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很糟糕。他们觉得战争就是最糟糕的事情，无论谁输谁赢”。林海从祖父祖母的描述里感觉到他们对二战没有骄傲也没有后悔，更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的只是对现在欧洲和平稳定的认可。

“如果每个国家的人都持有那种为国骄傲的态度，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将变得十分困难。”林海认为，德国之所以能走出二战的阴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法美意识到欧洲大陆的的稳定需要的不是一个失败者。“如果别的国家总说德国是个坏国家、做了坏事，尤其会让德国百姓产生抵触情绪”，这反而会



去年，德累斯顿市民手举反纳粹标志纪念德累斯顿遭受六十九周年

不利于欧洲大陆的稳定。

教育比道歉更重要

战争的伤痛总是需要一些人来抚平。在很多人看来，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遇难者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抚慰了深受二战之苦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拉近了德波两国的距离。但林海认为，勃兰特的下跪仅仅只是个象征。

教育比道歉更为重要，林海说道：“如果日本人真正了解历史、了解南京大屠杀，那么无论哪个政党、哪个领导人上台，日本人都真正理解中国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说起自己接受的教育，林海表示，授课老师在讲述二战历史时态度中立。“比如，他们需要解释纳粹主义有哪些组成部分，然后让学生自己思考。如何评价不是最重要的，但让学生了解、知晓这段历史十分必要。”

赴日特派记者访长崎原爆经历者小川忠义

不能只讲自己原爆受害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看，只有一根立柱的鸟居。”小川忠义拿着地图站在街角，指着不远处的山王神社旧址对记者说，“那一天，距原爆中心地 800 米的神社大鸟居失去了左半边，右半边却奇迹般‘站’到了今天。而再往前 50 米左右的地方，曾经是我的家。”

今年刚刚退休的小川一直生活在长崎，目前是九州日中文化协会理事。1945 年 8 月 9 日那道无声的闪光出现时，他才一岁。70 年过去，作为最年轻的“被爆一代”，他很努力地想回忆起什么又似乎难以言说。即便如此他觉得，“有必要将原子弹和战争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

那一天真的太可怕

“现在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约有 3.5 万人，平均年龄 80 岁以上。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去年一年就有 3500 人死去。”小川的话语哀伤中夹杂着一丝乐观，“所以我努力活着，争取做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

对于幸存者来说，劫后余生的故事回想起来就毛骨悚然。“被爆中心地，当年原子弹投下来的地方。”小川觉得此刻自己脚下站着的地方，过了 70 年依然漫溢着一种荒凉的压抑感。黑色的方形石柱象征着被爆地点，圆形波纹台阶象征着席卷一切的核爆冲击波。“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初中二年级。原来一颗原子弹投下来，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那一天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与其他原爆受害者相比，他觉得自己多少是幸运的。70 年前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被投下那天，襁褓中的他和父母正在远处避难，躲过了“最可怕的一波”。但一周后父母背上他查看距爆炸中心 1 公里之内的房子，一片瓦砾残垣之上遭遇了残留的辐射冲击。“谁也说不清后遗症会在什么时候显现。”小川的“被爆者健康手帐”记录着免费医疗的经历，他觉得自己目前倒没什么大问题，但偶尔会担心孙女那一辈会不会一样幸运。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讲解员向西方游客讲述当地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历史 吴宇桢 摄

没有谁会支持战争

长崎的地名中有很多以“和平”命名。原子弹的遭遇催生了当地人对和平的呼声。“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战争。”小川觉得，长崎往事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没有谁会支持战争。

但朴素的情感诉求背后，有些问题在小川看来仍然“复杂”。原子弹为何投下？日本如何走向战争？他觉得这些历史至今“没有被讲得清清楚楚”。记忆中父辈往往对战争历史讳

莫如深。学生时代的教科书大多讲到了明治维新这段历史便戛然而止，基本没有讲述“现代历史”。“这样下去，与中韩等邻国相处时会有麻烦吧。”他不无担忧地想。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似乎可以找到更多答案。资料馆以讲述原爆被害经历为主，在临近出口之处陈列着数块“年表”，讲述“日本如何走向军国主义”，其中有着“1937 南京大屠杀与三光政策”的字样。微妙的是，在全馆通用日英中韩四种语言呈现资

抵制纳粹主义思想

历史的坎总没那么容易跨过去，比如希腊人 2012 年曾将默克尔比作希特勒。“这让德国人觉得不舒服。”林海说，“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德国的进步很快很大？我们真的在否定纳粹主义，特别是跟日本相比，我们很努力。”

林海认为，与德国相比，很多其他国家对纳粹主义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深刻。虽然言论自由，但为了防止纳粹主义回潮，德国关于禁止与纳粹主义有关行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人，尤其是穷人，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德国东部地区的一些民众加入新纳粹组织，他们想要一个“德国人的德国”。“但德国人对这些主张很警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历史，知道纳粹主义的后果。”

林海介绍说，尽管在德国的一些地方议会中，新纳粹分子拥有少量议席，“慕尼黑可能也有”，但多数人抵制新纳粹主义。而由于宪法的限制，即便是议员也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肆意宣扬纳粹主义思想。

在林海看来，让新纳粹分子在政府中有一定数量的议席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否则他们可能会转向地下，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如今，德国人也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针对新纳粹在议会中可以拥有席位做出限定。

林海说，即便如今德国在欧盟中最有发言权，还是自认为不能“越界”，“否则会让其他国家感到害怕”。

虽然也是年轻人中的一员，但林海自认为如今的德国年轻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有些放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关系”。“但老一辈人在反思。”林海说，很多德国政治家、学者以及老一辈人都认为年轻人要记住历史，一定不能忘记。“如果我们的社会遗忘了历史，纳粹政党、法西斯政党可能会再度出现。”

料的情况下，这些历史的表述仅仅用了日语。“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面对记者的疑惑，小川也皱起了眉头。身旁，讲解员带领金发碧眼的欧美游客正与我们擦肩而过。

只讲受害不被理解

每年的 8 月 9 日上午 11 时 02 分，小川都会背上相机拍下那一刻长崎市内的模样。2012 年他参加了一个由民间 NGO 组织的“证言的航海”环球旅行项目，与其他原爆被害者一起到访 21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演讲会，讲述他们经历的历史。

旅行给了小川更多的思考。一个意大利人问这些高龄旅行者，“你们恨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人吗？”小川某种意义上理解那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手段。“如果不断延续仇恨，‘战争’不是没完没了、不会结束了吗？”

在新加坡，小川对当地人表达了日本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歉意。一个高中生听了他的演讲后说，“我感到了你的歉意。这些都是战争造成的，你们作为老百姓，不用道歉。”“我当时真觉得有些如释重负。”小川回忆说，“作为原爆受害者，如果只讲自己是受害者，很难得到被害国人们的理解。历史上加害之事，做过就是做过了。如果诚实道歉、主动和解，今后就可以做朋友了吧。”

“为什么不向战争被害国道歉呢？”在这个意义上，他很难理解一些日本领导人的行为，更对近来的政治动向表示担忧。“安倍力推安保法案，这不是做着口头上说绝对不能做的事吗？绝对会引发战争的危险。”